

庚子救援研究

◎ 冯志阳 著

中华学人丛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学人丛书

庚子救援研究

◎ 冯志阳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庚子救援研究/冯志阳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7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978-7-303-23620-6

I. ①庚… II. ①冯… III. ①义和团运动—研究
IV. ①K256.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4232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GENGZI JIUYUAN YANJIU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 mm×980 mm 1/16

印 张:25.75

字 数:531 千字

版 次: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8.00 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王 强 李春生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序

庚子救援是过去研究中甚少论及的一个题目。志阳自2007年读博开始，即以此为题，从一点点搜集相关史料做起，不疾不徐，一步一个脚印，把相关档案、文献，以及散见于当年上海报刊上的各种有关救援的公启、章程、公函、电报、捐款清单、载回被灾官民名单、杂记等资料一一找出来，并加以系统梳理、排比与研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前后历时五年终于写成博士论文，比较完整地把这次救援的全过程呈现出来。论文于2012年被答辩通过后，经过数年沉淀，去年志阳又集中精力花了大半年时间对原稿进行全面、细致的增订删改，最终定稿。志阳在《后记》中叙其缘起：

记得那是刚刚考上博士不久的一次上课，我的博士生导师周武研究员在讲授上海史时突然提到，庚子国变前后北方社会出现了一股大规模的人才迁徙潮，很多政治、文化精英从京城迁居到上海，这极大地促使了上海在政治、文化上的崛起，其中最为集中的便是庚子救援行动，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有数千人被从京津地区救援到上海。然而，对于这次救援行动，不但学界研究较少，即使知道的也不多。周老师因而向听课的学生们建议，有兴趣的可以试着去关注关注。我当即便对这个题目产生了极大兴趣，此后便尝试着收集相关史料，很快就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并复印了陆树藩的一卷《救济日记》和五卷《救济文牍》，同时又从《申报》《中外日报》等晚清报刊上发现了大量相关史料。知道我有了这些史料基础，周老师又建议我将这个题目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于

是我的读博生涯便与庚子救援事件的研究生涯合为一体。

志阳讲述的这个过程，我自己已不太记得了。但我的确认为，与对庚子年次第发生于南北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之役、庚子西狩、东南互保、庚子勤王、庚子议和等一连串重大事件研究得众多和深入相比，庚子年间由上海绅商发起、组织和实施的大规模救援则显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众多近代史著作几乎不著一词，这是不应该的。而且，就庚子之变的整体研究而言，缺庚子救援这一块，也是不完整的。所以，当志阳把这部书稿交到我手里的时候，着实让我有点喜出望外。

我的“喜出望外”，除了对志阳的耐心和毅力表示惊讶外，更基于我对这个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艰难性的认知。庚子救援发生在京津沦陷这一被时人称为“自有家国以来未有之奇变”之后，与上述一连串重大事件深度交缠，互为因果。而且因为这种“深度交缠”，又不能不跟世纪之交中国的南北、官绅、华洋、新旧诸重关系深相勾串缠绕。因此，讲清楚庚子救援本身的始末原委已有难度，要厘清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的上述诸重深相勾串缠绕的关系，则尤属不易。

志阳此书最着力和最用心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在于“尽量完整地呈现庚子救援事件本身”。但要讲清楚这一救援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得对事件发生前后的具体时空情境有足够的了解。这一点，志阳有充分的自觉。他在《导论》中指出：“庚子救援行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日常世界中，并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制约。因此，要更好地叙述庚子救援事件，就不得不进入这个救援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时空情境中，深入探讨庚子国变前后南北间交通方式与通信方式的变化、京城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京官日常生活的变化等，此外还包括江南社会的义赈传统，中外贸易与江浙丝商群体在19世纪下半叶对于上海乃至江南经济的宰制性影响，京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色，以及华洋之间、官绅之间的微妙关系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与庚子救援事件直接相关的历史情境。这些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项，都不会比救援事件本身更为简单，因此笔者相当多的精力都花在构建支撑庚子救援事件得

以发生的地基上。”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志阳依据自己艰苦搜寻所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上海图书馆藏陆树藩《救济日记》及相当于救济善会“征信录”的《救济文牍》，盛宣怀档案中有关庚子救援的各类史料，以及《申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等当时上海报刊上所刊登的相关资料，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各有侧重地详尽论述了这一史所罕见的大救援的缘起、组织、过程及其影响，其中对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这两大救援主体组织的发起人、幕后支持者、宗旨、章程、组织机构、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各级成员、成立过程、具体的救援活动、救援成效等各方面内容的梳理尤为细致入微。此外，书中对救济款项的来源，特别是对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及粤籍官员的独立捐款及其动机、成效，以及救济款项在京官间的分配方式及其原因、效果的考察与分析亦颇有所见。至于对沦陷时京城世相与京官生活的摹写，对救援场景的叙述，更是历历如绘，每每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不过，就个人喜好而言，我更欣赏的还是书中的“余论”部分，即“庚子救援中的关键词”。与前六章偏重于叙事不同，这一部分的立意则在于阐释庚子救援这一事件背后的因果、联系及其意义。志阳在完整叙述庚子救援的全过程之后，特别从中拎出丝业、京官、省籍意识、东南意识、义赈等贯穿全书的五个关键词进行深入讨论，并以这种讨论来对庚子救援进行总结，不仅形式新颖，亦必有助于从更深广的脉络中理解庚子救援这一事件的由来及其演进。如此大规模的救援，而且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下展开的救援，绝不会是一个突兀的事件，在它的背后实际上浓缩着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特别是东南区域社会的变迁历史。这正是志阳想要追踪的历史脉络。他发现庚子救援的实际主持者几乎是清一色的丝商：最早倡议庚子救援且一直负责救济善会救援工作的陆树藩是丝商，负责东南济急善会日常事务的庞元济、施则敬是丝商，另一个救援组织“协济善会”的创办人杨兆鏊也是丝商。可以说，庚子救援行动几乎全是由江南的丝商们筹划组织完成的。任何救援都得耗费财力，特别是像庚子救援这样大规模的救

援更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丝商成为庚子救援的主力，跟开埠以后上海出口的大格局有关。由于地近江浙产丝区，上海出口贸易以蚕丝为最大宗，丝商因此而逐渐累积巨量财富，“成为晚清上海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最为显赫的财富拥有者”。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庚子救援全程中丝商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

在庚子救援中，无论是救济善会还是东南济急善会，都以京官为最主要的救援对象。原因何在？志阳的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各省京官与各省利益之间的紧密关联，由时人的笔记可以看出，各省京官几乎成为各省利益在朝廷的代言人。有学者以各省京官为最主要的救援对象诟病庚子救援，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已背离了“救济”和“济急”的初衷和本旨。我以为这是一种苛责，毫无道理。且不论庚子救援本身并不仅限于救援京官，也曾广泛地泽及普通百姓，救济善会七千余回南者中并非都是京官。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在京津地区开办平糶局，施衣“数万套”，“掩埋白骨几万千”，“米面医药不计其数”，显然也并非仅针对京官。实际上，救援以“乡谊”相号召，以“省籍意识”为底色，更容易“一呼响应，事集众擎”，这是国情，无可厚非。更何况当年倡议和主持救援的绅商，后来也并没有因为曾救援京官而获得实际的利益回报，有的还曾因此而负债累累，如陆树藩就因庚子救援而亏欠巨万，最后不得不将丽宋楼藏书悉数售与日本还债。其实，无论是救京官，还是救百姓，对那些慷慨纾难、不顾安危、仆仆于途的施救者，我觉得还是应当抱持起码的敬意。

另外，关于“义赈”在上海华人社会整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志阳在分析这个关键词时，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就上海的华人社会而言，无论何种力量想要参与到义赈事业中来，都会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行动框架中来。在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形成之前，上海义赈界的联合和统一，对于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显然是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的。”19世纪的上海，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华人社会，基本上是各省各行商帮的各自为政。正是长期不分地域的慈善

救济活动，使得上海华人社会逐渐拥有了一个有别于官府的公共领域，并形成了能为上海各省华人都认可的华人领袖。庚子救援之所以能够调动整个上海，乃至整个东南社会的力量，与统一的华人社会及其领袖在 19、20 世纪之交上海的出现密切相关。当然，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的形象不可能因为几次义赈就能成型，但义赈在增进帮派林立、互不统属的各移民群体的上海认同方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志阳这本书是厚实的，也是有见地的。厚实而有见地，一方面说明他在这个题目上下过切实功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肯下功夫又勤于思考，这样写出来的著作虽未必炫目，但一定不会是过眼烟云。

周武

2018 年 6 月 14 日

写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庚子国变中的京官	23
第一节 无主之城	26
第二节 京官的日常生活	44
第三节 京官视野中的庚子国变	59
第二章 南北之间的交通与通信	74
第一节 庚子年间的南北交通	74
第二节 庚子年间的南北通信	90
第三章 从“江浙”到“东南”：救援组织的成立	113
第一节 救济善会的成立与东南意识的表达	113
第二节 济急善局的成立与陆路救援	131
第四章 “泽被宣南”：对于京官的救援	157
第一节 东南济急善会	158
第二节 “各省同乡济各省同乡”	180
第三节 疆吏与庚子救援	208
第五章 华洋官绅之间：以救济善会的活动为主	227
第一节 陆树藩与“救命船”	227
第二节 华洋之间	250
第三节 官绅之间	265
第六章 救援行动的终局	280
第一节 运送“浙江三忠”灵柩回南	281

第二节 京城社会秩序的逐渐恢复	288
第三节 救援组织的善后	296
余论 庚子救援中的关键词	303
第一节 上海的丝业时代	303
第二节 京官：中央与地方之间	311
第三节 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	320
第四节 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	331
附录一 庚子救援大事记	345
附录二 人物小传	360
附录三 三十三名京官籍贯	368
附录四 《救济日记》	371
附录五 严复在《大公报》上的一则佚函及相关问题考辨	383
后 记	396

导 论

光绪庚子年春夏间，酝酿已久的义和团突然在华北平原形成燎原之势，短时间内即遍布京津地区，甚者一度掌控京师城门之启闭，清王朝首善之区的正常生活秩序不复存在。继而八国联军先后攻占津京，驱散义和团，迫使两宫仓皇西狩，北京城原有的秩序荡然无存。在联军控制下的北京城，大批来不及出逃的京官，一方面随时可能遭到洋兵的抢劫与侮辱，另一方面则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与京官类似，在京绅商士民连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更遑论财产安全。在这些官绅商民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东南各省，他们本可回南度日，但当义和团弥漫于华北平原时，南下的陆路通道便已经成为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八国联军的舰队云集大沽口，更意味着南下的海路通道已经被堵死。对于这些困守京津只能坐以待毙的南省官绅商民，远在上海的一些东南绅商起而呼吁，号召东南官绅商民合力救援，庚子年的一场以南省京官为主要援救对象的救援行动就此拉开大幕。

一、命悬一线的清王朝

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仓猝西狩，没有来得及对京城留守事宜进行布置。至七月二十三日，两宫才于西行途中发布上谕：“荣禄、徐桐、崇绮均著留京办事，所有军务地方情形，随时奏报。”^①但因当时通信系统已完全瘫痪，行

^① 金家瑞、林树惠辑：《有关义和团上谕》，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在与留守京官消息隔绝，所以即使发布了关于留守大臣的谕令，但两宫对于留守大臣身处何地、生死与否等基本情况都一无所知。事实上，徐桐在京师城破当日便自缢而亡，荣禄、崇绮则逃出京城，且崇绮不久也自缢于莲池书院。两宫任命了三位留京办事大臣，但没有一人在京。七月二十七日，行在发布上谕，令马玉昆对“畿甸军情”，“派弁连环侦探，按日具报”。^①七月二十九日再次发布谕令：“留京大学士荣禄，现在是否仍在京师？抑或移札何处？著该提督一并探确，迅速具奏。”^②也就是说，行在虽然在七月二十三日便令荣禄等留守，但直到七月二十九日还无法确知荣禄身在何处。

同样，留守京官对于行在的消息也是知之甚少，甚至大部分京官对于两宫是否均已西狩还不得而知，如恽毓鼎于七月二十九日才“得确信”，知两宫均已西狩；而高栢、黄曾源、于式枚、李希圣、郑沅、陈璧、宋育仁等京官则于八月三日才最终确信两宫均已西幸。^③在联军破城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但留守京官们对于两宫消息茫然无知，各省督抚也是多方探听才确知两宫已经西巡。李鸿章在八月一日的奏折^④

① 《上谕》，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90～4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金家瑞、林树惠辑：《有关义和团上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43页。

③ 城破之初，大部分京官均认为并相信，皇上并未出逃，而是留京与洋人议和。参见高栢：《高栢日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174、176、182～1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另外，本书中作为人名的“栢”字仍统一采用所引文献的异体字写法，未改成简化字。特此说明。

④ 奏摺、折本是清朝的两种文书。折本的折，是动词；奏摺的摺，是名词，表示一种折叠的文书。在清朝，折本是交给内阁和御门听政大会处理的，奏摺是交给军机处处理的，二者保密程度不同，文体不同，篇幅也不同（折本厚，奏摺精炼）。《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根据简化字规范和约定俗成收入奏折一词，“奏折：写有奏章的折子”（《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1748页）；同时又指出：“‘摺’简化为‘折’，但在二字意义可能混淆时，仍用‘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1659页）。本书在行文中采用奏折一词，但若是引文，则根据所引文献是用“奏折”还是用“奏摺”仍旧维持不变。特此说明。

中表示：“于七月二十四、二十七等日，先后接袁世凯、廷雍来电，惊悉各国联军已于二十一日攻进京城，乘舆即于是仓猝西幸。”^①刘坤一在八月三日的奏折中言：“窃臣接据探报，七月二十一日各国洋兵进犯都城，銮舆西幸。闻信之下，五内震骇。当即飞电直隶、山西、陕西等省，分投探信。现得护理陕西抚臣端方来电，恭悉皇太后、皇上圣驾于七月二十七日行抵山西阳高县城，至驻蹕何处，探明后再行电知。”^②袁世凯则在八月五日的奏折中表示：“自本年七月二十四五日以后，道路纷传，洋兵内犯”，“当即迭派员弁，四处探听，而沿途梗塞，难得确音”，“嗣闻銮舆西狩，因复飞电陕西抚臣，敬谨探询，八月初四日准护理陕西抚臣端方电称，皇太后、皇上圣驾幸晋，初六可到太原”。^③张之洞更是在八月十四日才上奏朝廷表示：“臣等自七月下旬以来，北方警信日至，惟电线多断，文报动梗，未得确音，暨闻洋兵已入京城，虽传闻有銮舆西幸之说，不知是否成行，各报又参差互异，神魂飞荡，罔知所措”，“昨接大学士李鸿章自上海来电，奉到怀来县所发寄谕，并接护陕西抚臣端方来电，恭悉皇太后、皇上确已西巡，将抵太原”。^④

本书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列举当时的重臣、疆吏获悉两宫西狩消息的过程与反应，主要是想表达在电报时代清廷中枢与地方之间随时保持通畅联系的重要性。^⑤在电报时代，哪怕只是短暂地失去联系，某种程度上便意味清廷中央对于地方的失控，更何况是在联军攻占京城的形势下。设身处地，完全可以想象，在八国联军攻占京城而两宫却不知所踪的情况下，清王朝是否依然能够得到维持本身，便是督抚们

① 《调补直隶总督李鸿章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05页。

② 《两江总督刘坤一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15页。

③ 《山东巡抚袁世凯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19页。

④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64页。

⑤ 有学者曾对庚子“西狩”与电报通信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探讨，参见史斌：《论电报通讯与庚子“西巡”——近代中国技术影响政治一例》，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3)。

心中不可能不去琢磨的一个问题。^①京官高栢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昆、庆已晤赫德。约初一与赫信，初二三会公使说话。然各公使曰，‘但要光绪皇上在，即好办，如不然，“大清”二字恐难了’。”^②这段记载显系谣传，庆亲王奕劻此时正在随扈西行途中，如何能晤赫德？然而谣传亦能见人心，于此可见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际，清王朝是否就此覆灭，恐怕是当时包括两宫在内的所有人均心存疑惑而无把握的一个问题。

清王朝在当时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取决于两个群体的态度：一是各省督抚是否依然支持清廷；二是各国是否同意与清廷进行和谈。关于各省督抚的态度，吴天任曾表示，正是由于梁鼎芬“首倡贡方物之议”，“以示各省对清廷仍具向心”，才将“趋崩裂之局面，复能团结上下，一致对外”，“而清室之统治，乃得延长十年”。^③各国的态度从李鸿章的行止便可窥得一斑。盛宣怀在七月二十日的一封电报中便表示：“傅相约月底航海北上。”^④李鸿章则在七月二十六日致杨宗濂的电报中表示：“现电商各外部，请派全权会议，俟得复，再航海北行。”^⑤七月二十八日，盛宣怀在致刘坤一的电报中言：“傅相屡电各国不复，一得

① 据李细珠研究，“直到庚子八月初，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尚未与流亡中的清廷取得联系，并不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安全与否，均有茫然无措之感”，并表示这期间才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参见李细珠：《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载《近代史研究》，2010(3)。

② 高栢：《高栢日记》，见《庚子记事》，180页。

③ 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序例，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吴天任过于强调梁鼎芬的作用，显然言过其实。学界有关张之洞庚子年是否有过“帝王梦”的讨论，显示张之洞对于清廷和慈禧太后的忠诚无可置疑。参见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载《学术月刊》，2005(8)；李细珠：《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载《近代史研究》，2010(3)；孔祥吉：《再释张之洞帝王之梦——兼答李细珠先生》，载《近代史研究》，2010(5)；戴海斌：《庚子年张之洞对日关系的若干侧面——兼论所谓张之洞的“帝王梦”》，载《学术月刊》，2010(11)。

④ 《盛宣怀致畚昌宇电》，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⑤ 《李鸿章致杨宗濂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96页。

电即行。”^①八月三日，盛宣怀更在一封电报中表示：“各国以两宫离京，局面迥异，不认李相全权。”^②后因清廷添派庆亲王奕劻为全权大臣参与议和，各国才同意与清廷进行和谈。^③于是，盛宣怀在八月九日致杨宗濂的电报中表示：“傅相节后赴津。”^④

此后不久，陆树藩便向李鸿章陈述了救援京津被难官商的计划，并得到李鸿章的认可和支特，庚子救援行动就此拉开序幕。显然，庚子救援是在清王朝国力极其衰弱，几乎国将不国的情况下展开的救援行动，且被救援地区正处于敌国军队掌控下，因而只可能是主要依赖民间力量的一次救援行动。就此而言，庚子救援可谓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次战争救援行动。^⑤

二、观常知变

虽然是研究“救援行动”，但本书的问题意识既不因为它是兵灾引起的救援而归属于灾荒史的范畴，也不因为它是由善会实施的救援

① 《盛宣怀致刘坤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200页。

② 《盛宣怀致冯光通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210页。

③ 《盛宣怀致尚其亨电》《盛宣怀致冯光通电》《保定电局致盛宣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209～210、223页。因为李鸿章与俄国关系密切，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各国“拒纳其为谈判对手”。同时，也是在英国的推动下，奕劻被增派为议和全权大臣。参见戴海斌：《“无主之国”：庚子北京城陷后的失序与重建——以京官动向为中心》，载《清史研究》，2016(2)。

④ 《盛宣怀致杨宗濂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219页。

⑤ 不久之后发生的日俄战争，中国东北成为战场，清廷宣布中立，“官方不便出面救助难民”，上海绅商因此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战争难民进行救济。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最重要的支持便来自清廷，“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内帑10万两给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该会当时总共也就募集了“约20万两”。也就是说，当国家力量一旦得到恢复，这种全国性的大规模救援，国家很容易便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此后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成立，国家力量在其中也隐约居于主导地位。参见张建伟：《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20～4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而归属于慈善史的范畴。^① 本书首先是将这次救援行动视为一次事件，

① 目前为止，专门对庚子救援事件进行探讨的论文有两篇：一篇是李文海、朱浒 2004 年发表于《清史研究》的论文《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一篇是阮清华于 2005 年发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论文《非常时期的民间救济——以“庚子之变”后上海绅商义赈为例的探讨》。李文海、朱浒一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江南地方精英何以能在此时跋涉数千里，到地域性质完全不同的华北地区开展救援行动”。其问题背后的理论关怀是，通过对庚子救援事件的梳理和研究来反思“以往地方史研究框架设定的界限”。李文海长期致力于灾荒史研究，也是国内最早对晚清义赈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李文海将义赈视为“光绪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变化，才开始兴起的”一种“民捐民办”的慈善活动，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因为民间自发组织的赈灾行为在义赈兴起之前便已存在，那晚清义赈又如何与此前的民间赈灾进行区分呢？李文海指出以往的民间赈灾“具有很大的地区局限性”，“某个地方发生了灾荒，就在该地区范围内进行募捐活动，至多也只是扩展到旅居个别大城市的本籍同乡范围，募捐的赈款自然也限于赈济本地的灾民”；而“光绪初年兴起的义赈，则完全突破了狭隘地区的局限，赈济对象，往往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地区，募捐的范围，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而且募捐活动往往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扩展到海外的爱国华侨”。参见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载《清史研究》，1993(3)。此后，朱浒在其博士论文《晚清义赈研究》和专著《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中，对晚清义赈进行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考察，理论关怀也一以贯之，即通过对晚清义赈的研究来突破以往的地方史研究框架。或许，正是因为李文海、朱浒长期专注于灾荒史和义赈研究，故将庚子救援事件置于灾荒赈济史的范畴，尤其是从义赈这个角度进行解读。虽然该文对于庚子救援事件的全貌进行了概述，但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有限的篇幅，都使得该文对于庚子救援事件本身的叙述显得过于简单，很多救援关节都没有梳理清楚。例如，将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分工明确的救援活动混为一谈，没有注意到济急善局扩展为东南济急善会这一救援机构的重要变化，也就更不会注意到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奕劻等疆吏、重臣独立于两大善会组织之外的救援活动。当然，这些要求对于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而言，显然是苛求，更何况该文的论述目的也并不在于救援事件本身。阮清华的论文主要从慈善救济的角度看待庚子救援事件，且完全将庚子救援事件视作一次义赈。同样，该文限于篇幅对于救援事件的叙述也较为简单。

除上述两篇专文外，朱浒、杨念群合作的《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5)]、池子华的《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史林》，2005(2)]和周秋光、杨智芳合作的《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等论文也都涉及庚子救援事件，但均将其划归有关红十字会起源的（转下页注）

有开始有结束，有施救者有被救者，有详细的救援过程，有丰富的救援细节，即尽量完整地呈现这次救援事件本身，是本书最为着力的地方。

这是一次规模庞大的救援事件。从组织者来看，救援行动中最重要的两个救援组织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前身是济急善局）可以说是直接秉承时任全权大臣李鸿章的意旨而设立的。东南济急善会的京局更是依托李鸿章进京议和时所带幕府人员而设的，且就在李鸿章下榻的贤良寺办公。此外，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对留守京官实施了独立于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之外的救援之举；庆亲王奕劻也电谕各省在旗督抚捐款接济在京旗籍官民。完全可以说，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王公大臣与封疆大吏大都参与了这场救援行动。从动员范围来看，盛宣怀作为东南济急善会的首要主持者，利用其掌控的电报局以李鸿章的名义向“各省督抚河漕提镇藩臬运道”发电呼吁“设法劝助各省同志”，后来也的确得到了各省督抚的积极响应。可见，这次救援事件的动员规模事实上已超越了东南各省的范围，直接面向全国。从救援效果来看，据救济善会创办人兼主持者陆树藩言，“由直北渡回南者计七千余人”。实际上，将被难官商士民救援回南不过是此次救援行动的计划之一。随着京城秩序的逐渐恢复，

（接上页注）论述中，重心都是在救济善会的“红十字”上。除论文外，一些著作或多或少也涉及庚子救援事件。较早关注这一事件的是闵杰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其以“中国救济善会——红十字的先声”为小标题对陆树藩与救济善会的救援活动进行了简介。朱浒在《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一书中论述“义赈场域中的中国与西方”时，将庚子救援事件置于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脉络中再次进行叙述与分析，与此前的论文相比，专著中的论述更关注“这场救援行动的红十字会性质”的表达及其局限。张建伟在《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一书中以“援引红十字会名义的慈善团体”为小节标题，论述了救济善会与济急善会在庚子年间“模仿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指出“两会声称模仿红十字会宗旨，事实证明也不过是便宜行事的措施而已”。由上所述，以往关于庚子救援事件的研究，主要是因为救济善会以红十字作旗号进行救援的举动，使得众多学者均将庚子救援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从学术脉络上看，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均将庚子救援事件置于灾荒史或慈善救济史的范畴进行考察与论述，缺乏对于庚子救援事件本身来龙去脉的细致考察，而这正是本书所欲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